



钱基博著作集

国学文选类纂

钱基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钱 基 博 著 作 集

国学文选类纂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文选类纂/钱基博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4

(钱基博著作集)

ISBN 978-7-5325-6202-2

I. ①国… II. ①钱… III. ①国学—文集 IV. ①Z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4415号

钱基博著作集

国学文选类纂

钱基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978-7-5325-6202-2

K · 1479 定价: 1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教育家。

钱氏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起即读《四书五经》,十五岁时读《资治通鉴》、《续通鉴》、《读史方輿纪要》等书。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钱氏在思想上基本上秉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根本理路,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自撰门径,同时亦以此为驾驭新知识、新学问的一种方法。

辛亥革命兴,钱氏曾在军政府中任职,但其一生的事业主要还是在教育。钱氏自十九岁始任家庭教师,二十六岁任无锡第一小学教员,二十九岁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教员,此后更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等职,直至最后以华中师范学院教职工的身份去世,钱氏一生可说是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教育者的身份,使得钱氏在秉持和改造传统学术理念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传统学问的传播和普及。从三十多岁时出版的《语体文范》到四十多岁时出版的《国学文选类纂》、《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等一系列著作,钱氏在学术上的所作所为均有推广和规范传统学问的旨意。在研究传统学问的同时,又力图使其成为普通知识人的日常所需,这构成了钱氏治学的另一特色,而这种特色又反过来使得钱氏的著作成了普通读者迈进国学门槛的绝佳指引。

钱氏一生著述甚多,《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中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文心雕龙校读记》、《读庄子天下篇疏

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等均可看作其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品。此次所出版的《钱基博著作集》，以收录钱氏有代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同时选收具有学术意义的代表性论文。其中《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五种合为一编，名为《国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诸书所用底本，皆经精心选择。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均改以简体横排，同时对原书所用的不符合现代习惯的标点符号进行了处理。对于原来存在较大问题的书，如《文心雕龙校读记》，由于原书夹注中并无点断，几至无法阅读，则重新进行了校点。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均进行了核校，除去一些明显的错字、古今字、繁简字径改之外，对原书文字的改动均用页下注的形式标明，以存原貌。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异体字等，则不行简化，皆保持原样。钱氏的著作是普通读者学习国学很好的入门途径，相信我们的工作将会对广大读者大有裨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5月

总叙

《国学文选类纂^①》之辑录既毕，意有未申，于是濡毫吮墨以发其指曰：

《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博文质无底，奚所能为役！独念博学通人，希圣有作，亦有辨章学术，条析流派，以示途辙，牖方来。谨以诵览所及，写著其文，以当明述，辑为六类：曰小学之部，曰经学之部，曰子学之部，曰史学之部，曰文学之部，曰校讎目录之部，而题其耑曰《国学文选类纂》。将以宏阐国学，考镜源流，统斯文之条贯，诏学者以知方；庶几国学之筦枢，文章之林囿也！悦有睹记旁逮，足备考论，见仁见知，义各有当，附之于篇，为后学治国闻者览观焉。然而鄙怀之所欲陈，则固别有在。悦挟册而以为窥国学之宏秘焉，博愿有以进之也。诚窃以为必先知“学”之涵义，而后可与国学。试条析而竟其义：

一、何谓“学”？按“学”之为言“觉”也。《说文·教部》：“斆，觉悟也。从教，从门。门，尚瞫也。白^②声。学，篆文斆省。”《白虎通·辟雍篇》：“学之为言觉也。”“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民之初载，其矇

* 据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校印。钱基博在其国学研究中，将国学研究范围分为六类：小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校讎目录，并称之为“国学的科别”。本书分三集：甲集小学之部、乙集经学之部、丙集子学之部，按《总叙》所称当有下册，但钱先生是否已撰著或出版过，不得而知。

① 据钱基博《版本通义》引姚鼐《古文辞类纂》光绪辛丑李承渊校刊本后序称，“纂”字本《汉书·艺文志》序《论语》云：“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嘉庆末康绍镛刻《古文辞类纂》误作“纂”，后皆承其误，通行作“纂”；然本当作“纂”。本书保存商务印书馆 1935 年本之原貌，仍作“纂”。

② 白，原误作“白”，据《说文解字》改。

未知；譬如宝在乎玄室，有所求而不见；白日昭焉，群物斯辩矣；学者，心之白日也。今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风而炎炽，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采徐幹《中论·治学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见《荀子·劝学篇》。惟“觉”斯征“学”，惟“学”乃臻“觉”。是故言“学”者不可不知“义”与“数”之辩；知之者觉，昧之者愚也。何以言其然？《荀子·劝学篇》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古人言学以圣为归。圣者，大觉至通之称。《庄子·天运篇》曰：“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说文·耳部》：“圣，通也。”《白虎通·圣人篇》：“圣者，通也。”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此知“义”与“数”之辩者也。《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此不知“义”与“数”之辩者也。於戏！让清乾嘉已还，学者方承惠栋、戴震诸老之遗风，袭为一种考据琐碎之学，辩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号曰汉学。群流和附，坚不可易。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若舍是不足与于“学”者！庸詎知汉学之所谓名物、制度、训诂、书数者，徒荀子之所谓“学数有终”，而无当于“不可须臾舍”之“义”也乎？古人为学以畜德，贯其义也；后儒讲学以驰说，逐于数也。虽然，荀子不云乎：“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见《荀子·劝学篇》。此“觉”与“不觉”之别，“君子”、“小人”之分也，不可不深察！

不可不熟虑！

二、何谓国学？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人心风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维持于不敝。其取之它国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发荣滋长之自有具，安见不求自得而外铄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扬国华也耶！是故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吾生四十年，遭逢时会，学术亦几变矣。方予小弱，士大夫好谈古谊，足已自封。其梯航重译通者，胥以夷狄遇之，而诃然自居为中国，以用夷变夏为大戒，于外事壹不屑措意，此一时也。“风气渐通，士知舛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詵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谭，不咨其是。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采严复《天演论序》。此又一时也。既世变日亟，国人晓然于积弱，则又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旧学寢以放废。于是“家肆右行之书，人诃专门之选，新词怪谊，柴口耳而滥简编。向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德，穷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久居矣。”采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然而行之二十年，厥效可指：衡政，则民治以为揭帜，而议士弄法不轨，武人为于大君；论教，则欧化袭其貌似，而上庠驰说不根，问学徒恣横议。放僻邪侈，纪纲无存。欲求片词只义，足以维系一国之心人者而渺不可得。国且不国，何有于治！於戏！古谚有之曰：“橘逾淮化为枳也。”况于谋人之国，敷政播教，将谓树一国之人文，而可以移植收其全功者乎！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效则既可睹矣。此又一时也。大抵自予之稚以逮今日，睹记所及，其民情可得而言：其始足已而自多，后乃蔑己以徇人。然见异思迁者，徒见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可蔑。而足已自多者，又昧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尽适。二者之为蔽不同，而失之国性之不自觉则均。是故言“国性之自觉”者，必涵二谛而义乃全：一

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可蔑”。昔罗马大哲尝作诗歌以大诤于国曰：“前车非远，希腊所程猗。希腊之花，昔何荣猗！彼昏不知，狎侮老成猗！黷其明神，薄其典型猗！万目异色，群耳无正声猗！纲绝纽解，人私自营猗！累世之业，隳其沉冥猗！嗟我国人，能勿惩猗！”采梁启超译。见《庸言报》第一卷第一号《国性篇》。嗟乎！吾每诵此，而感不绝于予心也！恍一国之人，自上下下，不复自知我国历史久之难能，文化发扬之可贵。本实已拨，人奋其知，自图私便，则国与民之所恃以转系于不坏散者，仅法律权力之有强制、生命财产之受保障耳，于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一旦敌国外患之强有力者临之，但使法律权力，足以相制；生命财产，足以相保；而蚩蚩者氓，只如驯羊叩狗，群帖焉趋伏于敌人之足下已耳！古今之亡国者，未或不由是也！恍有国之人焉，胚胎于前光，歌颂其历史，涵濡其文化，浹肌沦髓，深入人人。人心不同，而同于爱国；如物理学之摄力，转掬一国之人，而不致有分崩离析之事也；如化学之化合力，熔冶国人，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然后退之足以自固壁垒，一乃心，齐乃力，外御其侮，而进焉则发挥光大之以被于全人类而为邦家之光！此国性自觉之第一义也。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尽适”。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几何！而我乃如鲁灵光巍然独存，虽中间或被夷虏，为国大厉，而渐仆渐起，不旋踵而匡复故物，还我河山，歌斯哭斯以聚骨族于斯。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自解也。然树艺积久而必萎，国性积久而有窳。时移势迁，有不适者。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禴。”见《荀子·非相篇》。又曰：“礼时为大。”见《礼记·礼器》。因时制宜，宁容墨守；非有所矫，不能图存；固也。如人性然，变化气质，增美释回。君子道在修身，莫不然。然而不可不知者：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恍如“戕贼杞柳以为栲栳”，栲栳未成而杞柳先戕，庸杞柳之所利为之乎！然则斲丧国性以致富强，富强未致而

国性先坠，庸国人之所利为之乎！即中知，固知其不利矣。於戏！挽近以还，欧化东渐，国人相竞以谄；而浅尝之士，于所学曾未深求，辄据摭所闻西事以自矜诩，遂欲有所施行。其仁义道德传自往昔，为人生所必繇，古今中外莫能易，操之则存、舍之则亡者；则或以其中国老生常谈，放言高论，务摧灭之以为快。其尤甚者，乃至以弱肉强食为公理，以裸体相向为美术，以贪冒淫侈为文明。问其所以？曰：“欧儒云尔，我亦云尔也。”人心日即于浮嚣，国事日征其蠹螭。生心害政，以若所为，而曰“强国救群之道在是”，譬于饮酖而救渴，吾见渴之未救而大命已倾，国之未强而人心先坏。安其危而利其灾，所谓“强国救群之道”，果如是乎！然则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者，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倘欲发国性之自觉，其必自言学者知“义”与“数”之辩始。见《孟子·告子上》。

昔荀子劝学，兼综“数”、“义”，以为：“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见《荀子·劝学篇》。“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见《荀子·劝学篇》。则是荀子劝学，贯“义”与“数”而一之；彻始彻终，非二物也。后儒则离“义”与“数”而二之，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有陈其“数”而疏于“义”者，有明其“义”而遗乎“数”者。将以便举称，明殊指，为之题目，昭其涵容：一曰“人文主义”，一曰“古典主义”。

“人文主义”者，以为国学之大用，在究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而以名物考据为琐碎。此明其“义”而遗乎“数”者也。

“古典主义”者，以为国学之指趣，在考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而以仁义道德为空谭。此陈其“数”而疏于“义”者也。

於戏！国之有学，非一日矣。竖尽往古，亘极来今，盖亦有其变迁递嬗之迹可举者焉。庄生有言曰：“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见《庄子·天运篇》。事实之所诏我，实以两主义相摩相

荡，迭为兴仆，运转而不能自止者也。大抵汉学尚考据，明训诂。荀子所谓“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古典主义”之可征者也。宋儒道性善，明义理。荀子所谓“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人文主义”之可征者也。虽然，犹有辩：

汉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经世以致用，微言大义是尚；此汉学之近于“人文主义”者也。古文稽古以释经，名物训诂是谨；此汉学之偏于“古典主义”者也。然而今文极盛于西京，古学代兴于东汉；古学既盛而今文遽绝焉。《后汉书·郑玄传》曰：“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瓛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则是“古典主义”擅汉学后起之胜也。

宋儒有朱陆之争：朱子道问学，读书不害穷理。《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载：陈北溪答李贯之曰：“先生教人尊德性，道问学，固不偏废，而下力处却多在道问学上。”此宋儒之不废“古典主义”者也。陆象山尊德性，明心乃以见性。《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曰：“宗羲案：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先生与兄复斋会紫阳于鹅湖，复斋倡诗有‘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先生和诗亦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陆沉。’紫阳以为讥己，不怿。”此宋儒之尤重“人文主义”者也。然朱学极盛于宋、元；阳明崛起于明代。陆学重光，而朱学少衰矣。则是“人文主义”擅宋学后起之胜也。

然当宋儒未起，汉学将变之际，老、庄于魏、晋，佛于隋、唐，士大夫谭名理、崇高致，以清言为尚，以章句为尘垢，亦由风气穷而思变，学术蘄于自觉。厌考据之烦琐，无补人生；乐名理之简隽，欲以自慰。此实古今学术升降一大转机也。徒以玄谭自放，君子不贵；佛说外道，吾儒所鄙；国学一线，端系六经。然而魏晋经学，衍之东汉，统绪分明，详见《隋书·经籍志》。而有不同于东汉者。盖同者其传说，而不同者其精神。东汉言训诂，或流繁琐；而魏晋好名理，亦出简隽也。“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采

《朱子语类》。“自晋以来，改变不同，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说；晋人则不然，依经而自作文。”采《朱子语类》。则是“古典主义”也，而“人文主义”寓焉矣。后来宋儒之师心说经，其经义大抵汲魏晋之流风者也。然魏晋诸儒，尚解经而为经注，如王弼、韩康伯之注《易》，杜预、范宁之集解《春秋左氏》、《穀梁》，皆经注也。至南北朝则守一家之注而诠释之，且旁引诸说而证明之，所谓义疏者也。则是义疏者，盖注注而非注经。是故汉迄魏晋，经学也；南北朝，注学也。皇侃，熊安生，沈文阿，刘焯、炫之伦，著录繁夥。至唐孔颖达修订《五经正义》，贾公彦、元行冲、徐彦、杨士勋赅续有作，遂遍诸经。百川涸注，渚为渊海，信经学之极轨也。然则唐学者，殆集南北朝注学之大成，而为东汉古学尾闾之宣泄焉！

宋儒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游心六艺，旁参禅乘，周敦颐从僧寿崖学，阐太极无极之旨。程颢资性过人，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返求诸六经，而充养有得。张载勇于造道，已求诸释老，乃返求之六经。朱子亦阐禅理，阳儒阴释。宋儒无不如此。明德新民，壹主于率性修道。国学之人文主义，所以昭明于有宋，如日中天者，实以天竺明心见性，般若大觉之佛说西照，而吾儒率性修道，明德亲民之经蕴内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果艺异树，接种乃佳。生物然，学术亦有然也！惟五子不废问学，犹于吾儒为近；而陆王偏尊德性，弥于禅宗有会耳。

然自明中叶，王阳明以致良知，昌明陆学，风靡一世，号曰“姚江学派”，理想缤纷，度越前古。及其敝也，士不悦学，徒长虚僞！谈空说有，相矜以口，益见迂阔而远于事情。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蔑以自淑。逮晚明刘宗周证人一派，已几于王学之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革变，天下稍稍恶虚趋实。陆世仪、陆陇其等生清之初，始专守朱子，辩伪得真；高愈、张履祥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风气所鼓，一时景从。此由陆王之“尊德性”而反之于朱子之“道问学”者也。至顾炎武、阎若璩等卓然不惑，以为“经学即理学”，全谢山

《鮑埼亭文集·顾先生炎武神道表》曰：“晚益竺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故其本朱子之说，参之以慈溪黄东发《日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求是辩诬，开一代之风气，导厥先路。乾隆以还，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天下所宗。自是学者务于经籍传注，考订发挥。“诸经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张旧释，补阙匡违，若邵晋涵、郝懿行之《尔雅》，焦循之《孟子》，胡培翬之《仪礼》，陈奂之《毛诗》，刘宝楠之《论语》，陈立之《公羊》，孙诒让之《周礼》，是也。或甄撰佚诂，宣究微学，若孙星衍之《尚书》，张惠言之《周易》，刘文淇之《左传》，是也。或最括古谊，疏注兼修，若惠栋之《周易》，江声之《尚书》，是也。诸家之书，例精而谊博，往往出皇、孔、贾、元诸旧疏之上。盖贞观修书，多沿南学，牵于时制，别择未精。《易》则宗辅嗣而祧郑、虞。左氏则尊征南而摈贾、服。《尚书》则崇信梅、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学并亡，厥咎郅钜！加以义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为弥缝；孔颖达之正义《五经》，各尊其注，两不相谋，遂成违伐；若斯之类，尤未允惬。而清儒新疏，则扶微据佚，必以汉诂为宗；且谊证宏通，注有回穴，辄为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然则言经学者，莫盛于义疏；而为义疏者，尤莫善于清乾嘉诸儒！”采孙诒让《籀庹述林·刘恭甫墓表》。此由朱子之“道问学”，反本修古而为东汉之古学者也。则是“人文主义”之积痼于明季，而“古典主义”于以重光焉。虽然，人苦不自觉，而不安于不自觉，于是乎言学。倘言学者，数典不足以经世，具数无所陈其义；譬如五官百骸，形体徒存，而神明不属，生气何托！不以训诂名物自安，必欲进而求微言大义；人之情也，学之道也。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厥为清儒言今文学者之权舆。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唐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皆杂宗郑、王。今所传《十三经注疏》者，《易》用王弼，《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用毛公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

记》皆用郑玄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其余诸经皆汲东汉古文家之流。西汉所谓今文十四博士者，其学说皆亡，仅存者惟《春秋公羊传》之何休注而已。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则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嘉道以还，庄存与、刘逢禄祖孙相嬗，刘逢禄为庄存与之外孙，弱不好弄。母氏诲之，学必举所闻于外王父以纠俗师谬说。年十一，初谒外王父，叩以所业，应对如响。曰：“此外孙必能传吾学。”详见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礼部刘君传》、戴望《滴麟堂文集·故礼部仪制司刘先生行状》。世以《公羊》名家，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凡公羊家言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言今文者宗之。龚自珍说经好庄、刘，尤擅要眇之思，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益为言学者所喜。南海康有为能敷说《公羊》改制以言变法，禅其弟子；新会梁启超，益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声生势张，而言今文学者盈天下矣。此由东汉之古学，又溯而上以反诸西汉之今文者也。则是“古典主义”之渐厌于晚清，而“人文主义”相与代兴焉。

方晚清今文大昌之日，独德清俞樾治古学，号东南大师，为鲁灵光。章炳麟《太炎文录·俞先生传赞》曰：“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第之，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是时先汉师说已陵夷矣，浙犹轂张，不弛愈缮。不逮一世，新学孺生，灭我圣文^①，繁而不殫，非一隅之忧也。”其弟子章炳麟恢张其绪，尤擅声音训诂，好称引左氏，而无害于言革命，谓“贾逵言‘左氏义深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辞。若夫‘称国弑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杜预于此最为宏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辈多谓预借此以助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则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犹视乎蓺泽’也！”见章炳麟《太炎文录·再与刘光汉书》。儒林之言革命者，咸以章炳麟为巨擘矣！于是治今文者言保皇变法，学古文者倡排满革命，昭昭然如泾渭分而鸿沟画也。清廷既覆，革命成

① “文”字原脱。

功，言今文者既以保皇变法，无所容其喙，势稍稍衰息矣。而章氏之学，乃以大白于天下！一时北京大学之国学教授，最著者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辈，亡虑皆章氏之徒也。于是古学乃大盛！其时胡适新游学美国归，方以誉髦后起讲学负盛名，以为“清儒之所谓汉学者，一名朴学，对于宋儒之理学而言，不外文字训诂、校勘考订之学。而其治学之法，不外两事：曰‘大胆的假说’，曰‘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此欧儒之所以治科学；而吾国惟治朴学者为得其意焉！”见《胡适文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于是言古学者，益得皮傅科学，托外援以自张壁垒，号曰“新汉学”，异军突起。而其所为不同于东汉古学者，盖以《周礼》为伪托，目《尚书》非信史，又谓“六籍”皆儒家托古，胥同今文学说也。惟今文家意在经世，而新汉学主于考古，议论虽同而归趣不一。此新汉学之所以异今文，而与东汉古学同其归者也！然东汉古学，欲以信古者考古，而新汉学，则以疑古者考古。此又新汉学之所为不同于东汉古学。而要其归，在欲考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则又无乎不同者耳！万流所仰，亦名曰“北大派”，横绝一时，莫与京也。独丹徒柳诒徵，不徇众好，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号曰“学衡派”。世以其人皆东南大学教授，或亦称之曰“东大派”。然而议论失据，往往有之。又以东大内畔，其人散而之四方，卒亦无以大相胜。然“古典主义”者，国学之歧途，而“人文主义”，则国学之正轨，未可以一时之盛衰得失为衡也！诚窃以为言国学者当以人文主义为宜。何以言其然？

其故有二：

一就国学二字顾名思义言之。按“学”之为言“觉”，“国学”之为言“国性自觉”，吾则既言之矣！然惟“人文主义”之国学，斯足以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理之自然，必至之符也。“人文主义”之

一名词，在欧土与“物质主义”为对；在吾儒与“古典主义”为对。“古典主义”，昔人之所轻；“物质主义”，今世之所患。何以言其然？“人文主义”之所寓，昔人谓之“义”。“古典主义”之所陈，昔人谓之“数”。《礼记·礼运》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此持“人文主义”者也。《荀子·荣辱篇》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此守“古典主义”者也。然“数”有可陈，而其“义”难知；“数”有可革，而其“义”不变。《礼记·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谨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则是“数”有可陈，而其“义”难知也。《礼记·大传》曰：“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则是“数”有可革，而其“义”不变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义”之未协，“数”徒具文！则是“义”尊而“数”卑，“义”先而“数”后也。故曰“古典主义，昔人之所轻”也。抑吾闻之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氏（Irving Babbitt）者，尝倡人文教育以申儆一世；其大指以为：“西洋近世物质之学大昌，而人生之道遂昧！科学工商日益盛，而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愈失！于是熙熙攘攘，惟利是崇。而又激于感情，中于诡辩，群情激扰，人奋其私，是非善恶，无所准绳。而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则常以互相残杀为事。科学发达，人心益以不静，而为神明之桎梏。哀哉！此其受病之根，在人之昧于所以为人之道。盖物质与人生，截然两途，各有其律。科学家发明物质之律，非不精能也。然以物质之律，施之人生；则心为形役，玩物丧志；私欲横流，人将相食。盖人生自有其律。今当研究人生之律以治人生。人文教育者，即教人所以为人之道。”见《学衡》第三期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有慨乎其言之也！呜

呼！《记》不云乎：“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迹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迹，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见《礼记·乐记》。而今适其会也。数十年来，海内士夫，貌袭于欧化，利用厚生，制驭物质之一切科学教学，未能逮欧人百一；而日纵亡等之欲，物质享乐，赍赍逮欧土而肩随之。物屈于欲，欲穷乎物。生人道苦，乱日方长。故曰：“物质主义，今日之所患”也。然则验之当今，惟“人文主义”，足以救“物质主义”之穷。稽之于古，惟“人文主义”足以制“古典主义”之宜。国学者，“人文主义”之教学也；舍“人文主义”之教学，更何所谓“国学”者！盖惟“人文主义”，为足以发吾人之自觉；亦惟“国学”，为能备“人文主义”之至德要道。舍“人文主义”而言国学，则是遗其精华而拾其糟粕，祛其神明而袭其貌焉也！国性之不自觉，神明不属，譬之则行尸走肉耳，其何以国于大地！南山可动，吾言不易矣！

二就国学之所由起言之。国学之所由起，所以说明一国之“人文”。“古典”者，“人文”之遗蜕也。春秋以前，我国有政无学，有君、卿、大夫、士而无师儒。周辙既东，官坠其职；于是百官之守，一变而为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是也。“百家之学”，所为异于“百官之守”者；“百官之守”者，谨守其“数”，“百家之学”者，宣究其“义”；此国学之所为起也。余读《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家；其中农家者流，特明术而不为学；盖术者致于用，而学者究其义也。小说家者流，又稗说而不为学；盖说者听诸途，而学者得于心也。此固卑之无甚高论。即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家而曰杂，则非专门名家矣。其间可得而名家者，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纵横七者而已。独儒、道二者，囊括群流，为一切